

长征途中的“扁担银行”

日前,被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列入全国第一类红色金融旧址保护名单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湖南汝城)旧址完成修缮,正式对外开放,其专题展览再现了红军长征途中一支特殊编队(国家银行)的铁血荣光。这支队伍没有枪炮,只有算盘、账本和扁担挑子。“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和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中,他们用草鞋踏出、扁担挑起一段“神一样的旅程”,守护红色金融的“火种”,保障红军的物资供给。

扁担银行

1934年10月,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率领曹菊如、黄亚光等14人以及200余名运输队员,挑上一百余副担子,从瑞金云石山下的跛子村出发,随中央红军长征。就这样,国家银行变成了“扁担银行”。

国家银行积攒的这份家当受到高度重视,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长袁福清担任大队长,并由一个连的兵力护卫前行。然而经过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战役后,国家银行的轻重机器全部埋掉,第十五大队行军速度明显加快。

1935年初,红军进入黔北重镇遵义。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但是此时的遵义城中,人们还不知道这个惊天动地的变化,仍然是静悄悄。甚至在一些反动分子的谣言蛊惑下,一些百姓跑的跑、藏的藏,没有几个人影。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看见这种情况,立即请示中央:能否破例在遵义搞一次“红军票”的发行?中

央同意后,毛泽民不顾疲劳,率领国家银行为数不多的几名工作人员,立即准备,付诸行动。

1935年1月12日,在遵义三中(今遵义十一中)操场上,“万人大会”召开。会议宣布成立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毛泽民负责筹款和征集物资。于是,毛泽民兵分两路,一路去查抄、没收、拍卖反动军阀王家烈、柏辉章等垄断开办的米行、盐行、烟行、布庄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田产财物,将他们的不义之财,大部分分给贫苦大众,少部分留作银行资金;另一路,动员、发动遵义的开明绅士、工商业者向红军募捐军饷,为国家银行筹集资金。

播种信用

“红军票”上市流通时,一开始并不顺利。一小撮坏人造谣,构陷“红军票”就是以前军阀常用的“军用票”,过后就是废纸一张。这时,红色政权为其保驾护航,保障了“红军票”的流通。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罗梓铭等的领导下,毫不手软地镇压了投机奸商黄老四等人,并大力宣传,号

召人们大胆使用“红军票”。

随后,毛泽民率领国家银行人员上街动员,红军官兵全力配合。一时间,店铺门庭若市,热闹非凡。遵义街上,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熙熙攘攘。特别是红军官兵,纪律严明,买卖公平,秋毫无犯,老百姓看到了久违的清平世界,喜笑颜开,无不欢欣鼓舞。

踏上征程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出遵义。但当时还有相当数量“红军票”在群众手中。为了不让群众受损失,维护红军信用,忙坏了国家银行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当即以苏维埃国家银行名义发出公告,欢迎社会各界来兑换苏区钞票。接着,在遵义闹市区设立6个兑换处,桌上堆放着银圆、食盐等硬通货和物资,任其挑选,市价兑换,还有优惠。直至“红军票”基本收回,才在主力部队离开后,追上队伍,踏上新征途。

1935年10月19日,国家银行随中央纵队到达陕北吴起镇。14名工作人员仅剩毛泽民、曹菊如、黄亚光、莫钧涛、曹根全、任远志、钱希钧和

郭金水8人;200余名运输队员仅剩10余人。同年11月初到达瓦窑堡。国家银行工作人员把分散的金银珠宝收回国家银行统一管理。经清点,国家银行总资产有黄金2担、银圆12担,几十种珠宝都完好无损。国家银行资产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没有损失一块银圆。国家银行在瓦窑堡驻扎下来后,毛泽民调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国家银行利用一个改建的马厩棚重新开张营业。同年11月下旬,国家银行改称“国家银行西北分行”。

一诺千金

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曾规定沿途不发行苏区纸币。但这次长征途中规模最大,影响极广、唯一一次的纸币发行、流通和回笼全过程,在党中央批准下,短短12天,即圆满完成,不愧是世界金融史上的一次奇迹。“扁担银行”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创造性地经营,配合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播种红军信用,历久弥坚。

(综合《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湖南日报》)



塞纳河曾是巴黎市民休闲娱乐去处

塞纳河是巴黎的母亲河,除了带来航运便利和充沛水源,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巴黎居民游泳休闲的好去处。但到了19世纪,法国各界开始对塞纳河水质充满担忧,去游泳池游泳成为巴黎市民的新风尚。那时,巴黎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口规模膨胀,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急剧增长,未经处理的污染物和废水排入塞纳河,河水质量逐渐恶化。还曾有研究证实,流经巴黎的塞纳河是世界上重金属含量最高的河段。

1889年6月16日,《费加罗报》的一篇专栏文章描绘了

水太臭,塞纳河百年前禁止游泳

2024年巴黎奥运会即将举行,奥委会和巴黎市政府仍在为改善塞纳河水质而紧锣密鼓地努力。从现实看,这些工作是为了兑现2024年巴黎奥运会前的承诺——塞纳河上将举办精彩的水上开幕式,而河道本身也将成为奥运游泳赛场的一部分。从历史看,塞纳河水质的改善将废除禁止游泳的百年禁令,让巴黎市民和游人可以重新亲密接触河水。

塞纳河水质情况,记者埃米尔·戈蒂埃写道,“这是一条被死物沤臭的河”,随后他列出了塞纳河一年清理出的动物尸体清单:“2021只狗、977只猫、2257只老鼠、507只鸡鸭、3066公斤肉类内脏……”

同一时期,随着微生物学的发展和污染测量技术的进步,巴黎人对河流污染的认知不断深入。儿科医生特奥多尔·埃舍里希于1885年发现了大肠杆菌,这种细菌在受污染的塞纳河水中会大量繁殖,但那时巴黎市政当局对水质污染问题并没有总体解决方案。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巴黎当局开始治理塞纳河

污染,总的来说,这些治理短期内有一定成效,但并没有扭转塞纳河水质日益恶化的趋势。

1921年,有科学家警告巴黎游泳者称,在塞纳河游泳前最好接种伤寒疫苗,游泳时要紧闭嘴巴防止喝入河水,每次游泳后要彻底清洗身体。1923年,巴黎市政府下令禁止在塞纳河游泳,这项禁令一直持续至今。

最近数十年来,巴黎塞纳河流域修建了多座污水处理厂,水质有一定改善,但还没有达到可以游泳的程度。2024年奥运会的举办,加速了早已开始着手的治理工作,让巴黎市政府可以筹集充足的

资金推进数十个耗资巨大的治理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巴黎奥斯特里茨车站附近修建的地下引水隧道和地下蓄水池,当出现暴雨时,未经处理的污水就会流入蓄水池,而不会直接排入塞纳河。

此外,对于直接向塞纳河排污的老式居民楼,巴黎市政当局发放补贴来改造排污管道,将其接入市政排污系统。此外,巴黎市政府宣布所有船只的污水都必须排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巴黎市政府和居民希望经过共同努力,把塞纳河从让人远离的有毒之河变成亲民的休闲之河。

(摘自《西宁晚报》杨光/文)

中日韩合作再出发带来多重利好

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日前在韩国首尔举行。在中日韩合作机制建立25周年之际,时隔4年多再次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标志着三国合作的重启和再出发。

当前,俄乌冲突延宕,巴以冲突不断升温,美国力促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全球安全与稳定面临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中日韩三方能够有效管控分歧,重启三国合作机制,将带来多重利好。首先,对东北亚地区局势是重大利好,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将产生积极的溢出和带动效应。国家间交往犹如逆水行舟,良好的沟通和常态化合作机制有助于加深理解、求同

存异。就此意义而言,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向世界传达的重要信号是,美国主导推进“小多边”机制看似一路高歌,实际上也并非铁板一块。地区局势越是紧张动荡,中日韩越需要建立紧密、稳定的合作关系,和平与发展仍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大势。

其次,深化合作符合三国共同利益。中日韩经贸合作既有坚实基础,也有宽广的发展空间。众所周知,日韩与中国具有很高的经济依存度,中国多年来一直是日本、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和韩国在中国国别贸易伙伴中常年位列前四,2023年中日韩三国间贸易总额超过7000亿美元。经

过数十年发展,中日韩生产网络已经成为比肩北美、欧洲的三大生产网络之一。中日韩三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货物进出口总值全球占比均达到或超过20%。

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探讨了六大领域相关议题,分别是人文交流、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经济合作与贸易、公共卫生与老龄化社会、科技合作与数字化转型、救灾与安全。此次领导人会议有望推动三国在电子商务、数据流动、养老产业、绿色环保及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开展务实项目合作,增强合作动力,提振发展信心,进而为东亚地区繁荣发展注入新动能。

(摘自《环球时报》)

越南“反腐干将”苏林

据越通社报道,5月20日,越南国会第十五届七次会议正式选举苏林、陈青敏分别出任越南国家主席和国会主席。

1957年,苏林出生在越南北部兴安省的一个英雄家庭。他的父亲苏权在越南统一前长期潜伏南方从事特工工作,后来晋升至越南公安部监狱警察部队的最高负责人。苏林继承父亲的事业,1974年考入特殊学校人民保安学院第六期,毕业后进入内政部政治保卫一司工作。该部门后逐步整合为公安部安全总局,是越南最重要的情报和反间谍机构。

2007年,在陈大光离任安全总局副局长一年后,苏林接替了他空出的职位。这也意味着,苏林进入了陈大光之后的下一代高级干部梯队。此后十年,苏林的晋升节奏和他如今在政治局的军警背景同事几乎完全同步。2007年,苏林和公安部主管技术后勤工作的范明政同时晋级少将军衔。2010年,苏林、范明政同时晋升中将并升任公安部副部长。两人都在2011年首次进入越共中央委员会,2016年首次进入越共中央政治局。

2021年是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开始“熔炉”反腐败运动的第八年。八年

来,反腐败调查逐渐触及中央委员一级的干部。在阮富仲亲自主持的越共中央反腐败反消极指导委员会领导下,越共中央巡视委员会、中央检查委员会、越南最高检察院等部门,都曾发挥重要作用。

但从2021年年底案发的核酸试剂腐败窝案开始,代号“C03”的公安部反腐败调查局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一些线索在此之前已经埋下:2018年,苏林出任公安部长两年后重组C03。2020年,阮富仲多次批评反腐工作,重点是“检察部门与警方的协调不紧密、不规范、不有效”,导致自查和处理环节薄弱。2021年9月,公安系统出身的潘廷镞出任中央反腐败和反消极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而核酸试剂腐败案调查,让公安部的主导地位明朗化。核酸试剂腐败案和紧随其后的防疫包机腐败案,也标志着反腐败调查工作开始指向本届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2023年1月,时任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因对两案负政治责任辞职。在此之前,在越共中央政治局排位紧随苏林之后的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平明亦因此辞职。在此期间,公安部移民局多位负责官员也被卷入防疫包机腐败案,但苏林未受到影响。



苏林宣誓就任越南国家主席

近年来,苏林领衔负责了一系列针对各地省委的巡视检查工作。省一级发现的建设腐败窝案,在今年3月到4月导致了武文赏的老部下、王庭惠的助理被C03拘捕,武文赏、王庭惠辞职。(据《中国新闻周刊》曹然/文)

人们孤独地死去,躺在地板上,旁边是皱巴巴的衣服和脏盘子……数月甚至数年之后,人们才会注意到这里有一具尸体。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出现“孤独死”现象,随后越来越普遍。

在日本,如果以年为单位简单换算,每年将有大约6.8万名老年人在独居状态下去世。日经中文网2024年5月14日采访日本警察厅时获悉,2024年1至3月,独居且在自己家中去世的65岁以上老年人大约为1.7万人。具体来说,1-3月在通报及医生报告后由警察处理的独居者遗体(包括自杀)中,在自家去世的人数超2万人。

“孤独死”的问题日益严重,背后是老年独居者的增加,并叠加了少子化等问题。与此同时,受工业化和城市化影响,日本老人陷入社会性孤立。并且,日本家庭形态的变迁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另外,也有观点认为,“孤独死”趋势可能与日本当代忽视死亡的文化习惯有关。在此背景下,无人认领遗体的葬礼数量也创历史新高,有报道称,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2022年,日本各地为经济困难的个人或无人认领的遗体举办的公费葬礼数量首次超过5万。根据2023年3月首次公布的一项调查,2018年4月至2021年10月期间,日本有亲属但无人认领的死者人数为10.6万人。独居老人增加的主要原因则是未婚率上升,背后是对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充分支援措施的缺乏。

(据界面新闻5.30)

环球撷萃

印度高温再破纪录

印度正在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时间5月29日,印度首都新德里出现52.3℃的极端高温,打破印度全国高温纪录。同日,新德里出现今年第一起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事件。另据印度媒体5月26日报道,自3月1日以来,印度已经有1.6万例中暑病例,导致60人死亡。

特朗普成为美国第一位被判有罪前总统

当地时间5月30日,纽约一家法院陪审团裁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封口费”案中有罪,被控的34项罪名全部成立,对特朗普的量刑将在7月11日,也就是共和党人将正式宣布他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几天前公布。特朗普成为美国第一位被判有罪的前总统。纽约州检察官指控,特朗普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委托其时任私人律师科亨向艳星丹尼尔斯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以免后者声称2006年与特朗普有染的桃色丑闻影响选情。

英国“血液污染丑闻”赔偿总额或达100亿英镑

在英国,正是由于血液和血液制品不安全,数十年间,有3万多人在接受了受污染的血液后感染了艾滋病毒和肝炎病毒等,其中约有3000人已经死亡,并且这一数字可能还在增加。调查报告公开后,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这是英国政府的耻辱日”。英政府宣布的一项赔偿计划显示,赔偿的总额可能在100亿英镑左右(超922亿人民币)。(综合界面新闻、中新网)